

财政竞争、预算软约束与企业税负^{*}

胡洪曙 李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内容提要: 财税体制的不断优化以及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的不断规范是降低企业税收负担的重要因素。本文探究现行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竞争、不同预算软约束表现形式及两者之间的交互效应对微观企业税负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 税收竞争显著降低企业税负, 而财政支出竞争显著提升企业税负, 税收竞争的影响力度和显著性大于财政支出竞争。转移支付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而土地出让收入和融资平台债务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税负。交互效应显示, 转移支付会弱化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的作用, 而土地出让收入和融资平台债务均会强化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的作用。异质性分析还发现, 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对企业税负的作用, 转移支付、土地出让收入和融资平台债务及其与财政竞争的交互效应对企业税负的影响都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地方政府间财政竞争行为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税负的影响存在差异。本文研究对于规范地方政府财政竞争行为, 出台公平合理的税收政策, 设计差异化的财政政策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财政竞争 预算软约束 交互效应 企业税负

中图分类号: F812. 2; F812. 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5766(2022)06—0153—19

一、引言

财政与财税体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过去的“十三五”期间, 我国实施了持续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 为提升市场活力和促进企业快速成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2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各地也要结合实际, 依法出台税费减免等有力措施, 使减税降费力度只增不减, 以稳定市场预期”。在此背景下, 减税降费政策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减轻企业税收负担, 助推企业科技创新, 进而稳定产业链和经济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不仅取决于减税降费政策的力度, 财税体制的不断优化以及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的不断规范也是降低企业税收负担的重要因素。

在现行财政分权体制下, 产生了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和预算软约束问题 (Alesina 等, 2008)^[1], 并对企业税负产生影响。财政竞争手段主要包括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 在税收竞争方面, 地方政府主要通过竞相降低有效税率或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等途径, 以争夺财政资源和经济资源; 在财政支出竞争方面, 地方政府主要通过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为辖区内居民提供合意的公共服务, 进而吸引生

收稿日期: 2021 - 12 - 05

^{*} 基金项目: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科统筹建设项目 (WHCC202112);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生科研创新平台项目“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公共服务供给决策机制及政策优化”(202110404)。

作者简介: 胡洪曙, 男, 教授, 经济学博士, 研究方向是财税理论与政策, 电子邮箱: hongshuhu@126.com; 李捷, 男,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是财税理论与政策, 电子邮箱: lijiecpatax@163.com。通讯作者: 李捷。

产要素和人员的流入。预算软约束表现形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由于我国转移支付规模的确定和资金分配具有较大随意性,地方政府会利用信息不对称或者采取“跑部钱进”策略(钱海刚,2009)^[2],以获取更多的转移支付资金,因此现实中转移支付的相对弹性会导致预算约束相对软化。二是土地出让收入。“财政压力假说”认为,地方政府会为了缓解财政收支压力而扩大土地开发规模;“晋升激励假说”认为,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晋升考核体制会激励地方官员出让土地。三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并通过发行企业债、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为公共投资项目筹资。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日益复杂严峻、地方财政压力日益突出,地方政府突破预算框架参与过度财政竞争,并对预算软约束的依赖性日益增强,两者及其交互作用对企业税负产生了复杂影响,这影响到企业对减税降费政策的获得感。

已有文献较少从中国式分权管理体制下的财政竞争和预算软约束角度出发对企业税负展开研究,但是分别就财政竞争、预算软约束对企业税负影响进行研究的文献较为丰富。在税收竞争对企业税负影响方面,不同国家的地方政府间普遍存在显著的税收竞争行为(Chirinko 和 Wilson, 2010^[3];胡洪曙和郭传义,2014^[4]),税收竞争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和税种差异(龙小宁等,2014^[5];Maniloff 等,2017^[6]),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会降低企业税负(李明等,2016^[7];范子英和田彬彬,2013^[8])。在财政支出竞争对企业税负影响方面,财政支出竞争会弱化企业税收激励(贾俊雪和应世为,2016)^[9],地方政府以改变财政支出偏向为特征的竞争行为会提高区域技术创新水平(肖叶等,2019)^[10]。在预算软约束对企业税负影响方面,已有研究认为地方政府会对其产生过度依赖进而导致地方政府过度负债和财政支出效率低下(Goodspeed, 2002^[11]; Ong, 2012^[12]),其中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税收努力同时存在抑制作用和激励作用(胡祖铨等, 2013^[13];付文林和赵永辉, 2016^[14]),土地出让收入会降低企业实际税负(王雪婷和胡奕明, 2018)^[15]。少部分研究关注了财政竞争和预算软约束的交互作用,预算软约束为地方政府进行财政竞争提供了资金来源(钱海刚, 2009)^[2],转移支付整体上对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具有强化效应(李永友, 2015)^[16],财政竞争与预算软约束会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造成影响(杜彤伟等, 2020)^[17]。上述成果为本文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前期基础,充分研究了财政竞争的概念界定、存在性检验、经济效应和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分析了预算软约束的影响效应,也对财政竞争和预算软约束的相互作用有了初步研究。然而,目前关于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影响的相关研究大多基于联邦制财政分权理论,没有考虑中国特色的制度背景,如关注 GDP 增速的考核体系、财政纵向不平衡、土地财政和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等。同时现有文献对如下领域或现象关注不够:地方政府可能突破财政预算约束进行财政竞争,税收竞争的减税效应、财政支出竞争的溢出效应以及两者共同产生的要素流动效应的异质性。有鉴于此,本文将系统性分析税收竞争、财政支出竞争和不同预算软约束表现形式及其交互作用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并分地区和分产权性质考察这一影响的异质性。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从财政制度层面研究财政竞争和预算软约束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这对于完善财税制度体系以规范地方政府财政竞争行为,出台公平合理的税收政策以降低企业税收负担具有良好借鉴意义。第二,本文将财政竞争、预算软约束和企业税负纳入同一个理论框架进行系统研究,并从转移支付、土地财政和融资平台债务三种不同的预算软约束表现形式实证考察三者间的作用渠道与影响效应。这有助于在同一个理论框架内全面考察不同财政竞争方式与不同预算软约束表现形式及两者交互作用对企业税负的作用差异。第三,分地区和分产权性质考察了财政竞争和预算软约束对企业税负影响的异质性。由于不同地区和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受到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不同,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产生的影响必然存在差异,在同一框架下全面考察这些差异有助于设计差异化的财政政策。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中国式分权管理体制下,财政分权制度和政治管理体制分别导致财政纵向失衡和以经济绩效考核为主的政治晋升锦标赛(Li 和 Zhou,2005)^[18],进而共同导致地方政府间的财政竞争和预算软约束问题(Alesina 等,2008^[1];李永友和沈坤荣,2008^[19])。一方面,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会对企业税负造成不同影响;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可能突破预算约束以缓解地方财政收支压力,并为财政竞争提供资金支持,不同预算软约束表现形式会对企业税负产生不同影响。因此,在研究地方政府行为对企业税负的影响时,既要考虑财政竞争和不同预算软约束表现形式的作用,也要考虑两者之间交互作用的影响。本文基于这个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提出以下理论假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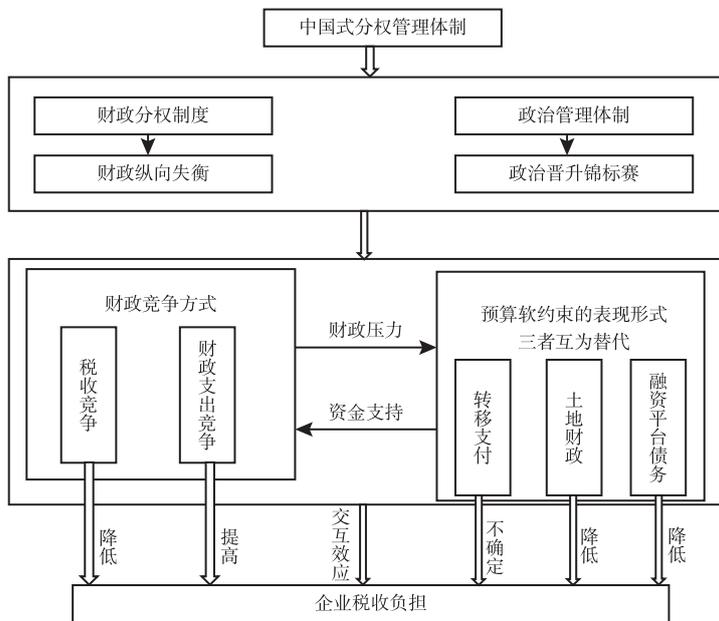


图1 财政竞争、预算软约束与企业税负的理論框架

1. 财政竞争与企业税负

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这两种不同的竞争策略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当地方政府拥有较大财政收入自主权时,通常采取低税负的税收竞争策略来“招商引资”,这必然带来企业税负下降。当地方政府拥有较大的财政支出自主权时,通常选择高支出的财政支出竞争策略以刺激经济增长,这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增加税收收入为支出筹资,进而导致辖区内企业税负上升(贾俊雪和应世为,2016)^[9]。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地方政府不能更改名义税率进而改变企业的名义税负,但是地方政府能够通过各种途径调整税收努力以改变企业的实际税负(吕冰洋等,2016)^[20],因此,调整税收努力程度经常成为地方政府进行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的重要手段。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₁: 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会降低企业税负,而财政支出竞争会提高企业税负。

2. 预算软约束与企业税负

(1) 转移支付与企业税负。作为调节财政纵向失衡的重要手段,转移支付一般通过影响税收努力进而影响企业税负。一方面,转移支付对税收努力具有税收替代效应。作为地方政府财力的重要补充,转移支付与地方本级税收收入具有一定的替代关系,转移支付收入的增加会减少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程度(付文林和赵永辉,2016)^[14],进而导致辖区企业税负降低。另一方面,转移支付对

税收努力存在激励作用。配套性转移支付一般要求地方政府提供配套资金,以完成上级政府制定的政策目标,这将激励地方政府通过提高税收努力的方式筹集财政收入以补充公共支出项目上的财力(胡祖铨等,2013)^[13],进而导致辖区企业税负上升。由于转移支付对税收努力具有正反两个方向的作用,转移支付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2)土地财政、融资平台债务与企业税负。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难以满足支出需求的现实制约下,地方政府会主动扩大土地出让收入和融资平台债务,这些收入有效缓解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足的窘境,并为城市建设和政府投资带来了充裕的资金。与税收收入相比,土地出让收入具有边际成本较低和自由裁量权较高的优势(余泳泽等,2019)^[21],随着土地出让收入增加,地方政府会因此主动降低税收努力程度(储德银等,2019)^[22],进而导致企业税负下降。融资平台债务主要用于公共部门的投资性支出,在未来能够产生预期收入以偿还债务本息,同时能够起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进一步形成高质量税源,这将弥补地方政府的当期举债,并对税收收入起到替代作用,进而促使企业税负下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₂:转移支付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土地财政和融资平台债务能够降低企业税负。

3. 财政竞争与预算软约束的交互效应

(1)不同财政竞争方式与转移支付对企业税负的交互效应。不同财政竞争方式对企业税负的影响会受到转移支付的影响。转移支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并减弱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对本辖区经济状况的依赖,进而减弱了地方政府对经济资源和财政资源的竞争(Liu, 2014)^[23]。中国转移支付同时存在融资效应和分配效应,融资效应显著弱化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而分配效应显著弱化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竞争(李永友,2015)^[16]。就税收竞争而言,转移支付融资机制不仅产生资本流动的外部性,同时在平衡预算约束效应和共同池效应下产生财政收入跨区域流动的外部性,这两类外部性使得转移支付对税收竞争形成较强的替代效应,并降低了地方政府采取税收竞争方式吸引资本的内在激励(李永友,2015)^[16],最终表现为转移支付会弱化税收竞争对企业税负的作用。相关研究也表明,转移支付中占主要比重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在抑制地方发展经济积极性的同时会降低税收竞争强度(Liu,2014)^[23]。就财政支出竞争而言,由于转移支付分配机制具有收入效应,转移支付成为中央政府弱化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的重要手段(李永友,2015)^[16]。分类探讨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对财政支出竞争行为的影响,则会发现三者存在显著差异。由于税收返还的资金分配与地方政府财力正相关,这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的动机,并强化了财政支出竞争。致力于财力均等化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在资金分配上一般和财力负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经济增长积极性,进而弱化了财政支出竞争。专项转移支付最大的特征在于规定了具体用途,这限制了地方政府的支出自主权,进而弱化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竞争。由于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在中央转移支付中所占比重较大,转移支付总体上对财政支出竞争起到弱化作用(贾俊雪等,2010)^[24]。随着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剧,地方政府会积极争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这又进一步弱化了财政竞争行为(杜彤伟等,2020)^[17]。

(2)不同财政竞争方式与土地出让收入、融资平台债务对企业税负的交互效应。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的影响会受到土地出让收入和融资平台债务的影响。土地出让收入和融资平台债务具有不规范和约束性低的特点,相比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更容易激化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进而导致地方政府展开过度的财政竞争(杜彤伟等,2020)^[17]。就土地出让收入而言,一方面,地方政府可能会采取高价出让住宅用地和商业用地的方式来保障地方财力,这一预算软约束行为将促使土地出让收入过快增长(雷潇雨和龚六堂,2014)^[25],并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行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可能会采取低价出让工业用地的手段招商引资(雷潇雨和龚六堂,2014)^[25],这相当于变相给予企业财政补贴,是一种隐性的财政支出,从而强化了地方财政支出竞争行为。

就融资平台债务而言,地方政府降低税率进行税收竞争和提高公共支出进行财政支出竞争,往往会导致税收不足和财政支出超出最优水平,融资平台债务使得地方政府能够在不增税的情况下通过银行贷款、发行公司债券等多种融资方式举借债务,以满足不断扩张的资金需求(饶品贵等,2022)^[26],这激化了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行为。随着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加大,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收入和融资平台债务的依赖性会显著增加,从而进一步增大地方政府间的财政竞争强度。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₃:转移支付会减弱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土地出让收入和融资平台债务均会增强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对企业税负的影响。

4. 财政竞争、预算软约束对企业税负影响的异质性

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财政状况等存在较大差异,且不同地区也面临着不同的财政压力,财政竞争、预算软约束及两者之间的交互效应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一般而言,东部地区省份经济较发达、财力状况较好,拥有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规模较大的企业和充足的税源,具有更强的动力增大财政支出规模以争夺流动性资本来发展本地经济(王文剑等,2007)^[27],并且适度增加税收努力不会对企业再投资等扩张性生产行为产生显著抑制作用(储德银等,2019)^[22]。与之相反,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较低、财力基础较为薄弱,并且享受更多的税收优惠政策,因而中西部地区更倾向于降低税收努力以进行税收竞争(肖叶和刘小兵,2018)^[28]。可以看出,不同地区会采取差异化的财政竞争策略,东部地区倾向于选择财政支出竞争手段,中西部地区倾向于选择税收竞争手段(李永友和沈坤荣,2008)^[19]。在预算软约束对企业税负作用方面,相对中西部地区,财力状况较好的东部地区对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更低(杜彤伟等,2020)^[17],更有能力通过提高税收努力的方式筹集更多的财政配套资金以达到配套性转移支付的要求,这使得转移支付对税收努力的税收替代效应比激励效应更弱,从而导致东部地区税收努力和企业税负上升;更为严格的财政预算和监督制度则有效地引导和规范了东部地区的土地出让行为,进而降低了其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由于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财政状况、房地产发展状况等方面占有优势,东部地区具有较高的债务耐受性(毛捷和黄春元,2018)^[29],并且形成了较为发达和规范的金融市场,融资平台债务对东部地区产生的财政压力相对较小,能够对税收收入起到替代作用进而有效降低企业税负。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₄:相对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税收竞争降低企业税负的作用相对较弱,而财政支出竞争提升企业税负的作用更为明显;转移支付降低企业税负的作用相对较弱,土地出让收入降低企业税负的作用相对较弱,而融资平台债务降低企业税负的作用更为显著。

就企业产权性质而言,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是政府,其生产经营行为会受到政府影响。在税收竞争方面,由于地方政府更加关心国有企业经营状况和盈利能力,且国有企业为当地提供大量就业岗位,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因此,地方政府会通过降低税收征管力度的方式减轻国有企业税负,以保证国有企业长期稳定经营,而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这种激励动机较弱(陈冬等,2016)^[30],最终表现为,税收竞争降低国有企业税负的作用更为明显。在财政支出竞争方面,国有企业承担起支持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行为和协助地方政府完成税收征管目标的职能(贾俊雪和应世为,2016)^[9],因而地方政府可能会将财政支出压力传导给国有企业,进而导致国有企业税负较高。最终表现为,财政支出竞争提升国有企业税负的作用更为明显。在预算软约束对企业税负作用方面,由于预算软约束的三种表现形式(转移支付、土地出让收入和融资平台债务)是地方政府除税收收入外筹措财政资金的重要渠道,其筹资方式不会干扰地方政府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征税行为,因而对企业税负的作用不存在产权异质性。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₅:相对非国有企业来说,税收竞争降低企业税负的作用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财政支出竞争提升企业税负的作用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预算软约束对企业税负的作用不存在产权异质性。

三、实证设计

1. 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可得性、统计口径变化和政策调整,本文选取 2009—2018 年 30 个省份(不含西藏和港澳台)和沪深主板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财政竞争和预算软约束对企业税负的影响。本文拟使用两个层面的数据:一是企业微观数据;二是省级层面数据。

企业微观数据主要来源于 CSMAR 数据库和 WIND 数据库,部分数据手工整理自上市公司财务年报。本文以 2009—2018 年沪深主板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并对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如下处理:剔除实际缴纳企业所得税、利润总额、所得税费用有缺失的公司;剔除所有者权益、实际缴纳企业所得税、利润总额、所得税费用和企业总体税负为负的公司;剔除以前年度发生亏损,在本年尚未弥补完亏损的公司;剔除计算得到的企业所得税税负、企业总体税负大于 100% 的公司;剔除 ST 和 *ST 的上市公司。最终剩余 11980 个观测值。为消除样本离群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 1% 和 99% 分位数上的缩尾处理。

省级层面数据主要涉及财政支出竞争、税收竞争、转移支付、土地财政、融资平台债务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指标。税收相关指标来源于 2009—2018 年《中国税务年鉴》和各省份税务统计年鉴,财政相关指标来源于 2009—2018 年《中国财政年鉴》和各省份财政统计年鉴,部分手工整理自各省份财政厅(局)官网。土地出让收入数据来源于 2009—2018 年《中国国土资源年鉴》和中国土地市场网。融资平台债务主要包括银行贷款和城投债,由于银行贷款数据不可得,本文选择城投债代替,城投债数据来源于 Wind 数据库,并经过整理汇总到省级层面。在样本筛选时,由于西藏政治经济地位较为特殊且上市公司数量较少,故删除了西藏自治区的数据。

2. 计量模型

借鉴以往研究(吕冰洋等,2016^[20];王小龙和余龙,2018^[31];杜彤伟等,2020^[17]),为检验财政竞争、预算软约束对企业税负的影响,本文设定基准模型如下:

$$ETR_{pit} = \alpha + \beta COMP_{pt} + \gamma SOFT_{pt} + \theta X_{it} + \mu_i + \e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ETR_{pit} 为省份 p 区域内上市公司 i 第 t 年的企业所得税税负; α 为截距项;核心解释变量 $COMP_{pt}$ 为省份 p 第 t 年的财政竞争指标,在实证回归中,本文将同时考察财政支出竞争($Expc$)和税收竞争($Taxc$)的作用; $SOFT_{pt}$ 为省份 p 第 t 年的预算软约束指标; X_{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公司层面控制变量和省级层面控制变量; μ_i 为公司个体固定效应,用于控制个体不随时间变化特征的影响; η_t 为年份固定效应,用于控制与时间相关的政策变化的影响;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

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层面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省级层面宏观变量,控制变量包含企业层面变量和省级层面变量,同一省份内的企业的随机扰动项可能存在相关性,为避免待估系数标准误出现严重低估,后续回归将标准误聚类到省级层面。

为了考察财政竞争与预算软约束的交互效应,本文进一步设定模型如下:

$$ETR_{pit} = \alpha + \beta COMP_{pt} + \gamma SOFT_{pt} + \omega COMP_{pt} \times SOFT_{pt} + \theta X_{it} + \mu_i + \e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为检验财政竞争、预算软约束以及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税负的影响是否存在地区异质性,本文引入地区哑变量 R 与主要解释变量的交互项,构建如下模型:

$$ETR_{pit} = \alpha + \beta COMP_{pt} + \gamma SOFT_{pt} + \omega COMP_{pt} \times SOFT_{pt} + \beta_1 COMP_{pt} \times R + \gamma_1 SOFT_{pt} \times R + \omega_1 COMP_{pt} \times SOFT_{pt} \times R + \theta X_{it} + \mu_i + \e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其中,地区哑变量的具体设置方式为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对于东部地区的省份,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财政收入较为充裕,赋值 R 为 1;对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省份,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财政状况一般较差,赋值 R 为 0。

此外,为检验财政竞争、预算软约束以及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税负的影响是否存在产权性质异质性,本文引入企业产权性质哑变量 S 与主要解释变量的交互项,构建如下模型:

$$ETR_{pit} = \alpha + \beta COMP_{pt} + \gamma SOFT_{pt} + \omega COMP_{pt} \times SOFT_{pt} + \beta_1 COMP_{pt} \times S + \gamma_1 SOFT_{pt} \times S + \omega_1 COMP_{pt} \times SOFT_{pt} \times S + \theta X_{it} + \mu_i + \e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4)$$

其中,产权性质哑变量的具体设置方式按照产权性质将上市公司划分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其他企业。对于国有企业,赋值 S 为 1;对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其他企业,赋值 S 为 0。

3.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根据本文研究目的,以及借鉴以往研究(李明等,2016^[7];陈晓光,2016^[32]),被解释变量企业税负选取企业所得税税负为衡量指标。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财政竞争(Comp),地方政府间的财政竞争包括税收竞争(Taxc)和财政支出竞争(Expc)两种方式。税收竞争用地方税收除以当地 GDP 作为税收竞争的计算依据。为方便解读实证结果,本文对税收竞争指标进行取负数处理,此时指标数值越大,说明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程度越高。财政支出竞争用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除以当地 GDP 作为财政支出竞争的计算依据(贾俊雪等,2010)^[24]。同时,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还有预算软约束(Soft),后文也会考察预算软约束在财政竞争和企业税负之间的调节作用。预算软约束包括转移支付(Tra)、土地财政(Ltf)和融资平台债务(Ctz)三种具体表现。本文借鉴储德银和费冒盛(2021)^[33]的做法,分别以人均转移支付、人均土地出让收入和人均城投债发行额来衡量转移支付、土地财政和融资平台债务规模。

本文在参考王小龙和余龙(2018)^[31]的基础上引入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和省级层面控制变量。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包括资产规模、企业年龄、资产收益率、固定资产密集度、资产负债率、雇佣人数和总资产周转率,省级层面控制变量包括人均 GDP、财政自主率、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本文对模型中除比例变量之外的所有水平变量均做了自然对数处理以增进数据的平稳性并缓解异方差。

所有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种类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计算方法和说明
企业税负变量	ETR	企业所得税税负	0.115	0.136	0.740	0	实际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利润总额
稳健性检验因变量	ETR1	企业总体税负	0.098	0.126	0.542	0	(支付的各项税费 - 收到的税费返还)/营业收入
财政竞争变量	Taxc	税收竞争	-0.098	0.038	-0.045	-0.181	税收收入/GDP(取负数)
	Expc	财政支出竞争	0.205	0.072	0.450	0.11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GDP
稳健性检验自变量	Taxc1	税收竞争	0.679	0.406	1.745	0.413	(全国税收/全国 GDP)/(本省税收收入/本省 GDP)
	Expc1	财政支出竞争	1.332	0.324	2.873	0.654	(本省财政支出/本省 GDP)/(全国财政支出/全国 GDP)
预算软约束变量	Tra	人均转移支付	0.309	0.200	1.867	0.001	中央补助收入/年末常住人口
	Ltf	人均土地出让收入	0.359	0.274	1.252	0.018	土地出让收入/年末常住人口
	Ctz	人均融资平台债务	0.133	0.149	0.807	0	城投债发行额/年末常住人口
稳健性检验自变量	Tra1	转移支付比率	1.324	0.873	5.302	0.085	转移支付/地方财政收入
	Ltf1	土地出让收入	0.470	0.236	1.395	0.040	土地出让收入/地方财政收入
	Ctz1	融资平台债务	0.176	0.169	1.448	0	城投债发行额/地方财政收入

续表 1

变量种类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计算方法和说明
企业控制变量	<i>lnasse</i>	资产规模	22.760	1.623	28.450	17.880	Ln(年末资产总额)
	<i>Age</i>	企业年龄	16.197	5.423	60	0	样本年度 - 企业开业时间
	<i>Prr</i>	资产收益率	0.036	0.052	0.203	-0.154	净利润/平均资产总额 其中,平均资产总额 = (资产期初余额 + 资产期末余额)/2
	<i>PPE</i>	固定资产密集度	0.326	0.189	0.982	0	固定资产净值/资产总额
	<i>Lev</i>	资产负债率	0.515	0.208	0.944	0.084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i>Lemply</i>	雇佣人数	8.024	1.486	11.770	4.174	Ln(雇佣人数)
	<i>TAT</i>	总资产周转率	4.136	3.791	18.394	0.360	营业收入/平均资产总额
省级控制变量	<i>PerGDP</i>	人均 GDP	10.93	0.533	11.940	9.289	Ln(滞后一期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i>Fzz</i>	财政自主率	0.639	0.202	0.940	0.148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i>Sec</i>	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	0.430	0.096	0.590	0.186	第二产业增加值/GDP

从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企业所得税税负的均值为 11.5%,与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 25% 存在明显差异。在企业所得税实际征收过程中,地方政府为了吸引资本、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往往给予企业税收优惠或降低税收征管强度,从而使得地方政府对企业所得税的征管相对来说弹性更大,最终表现为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低于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①。企业所得税税负的最大值为 74%^②,最小值为 0,标准差为 0.136,上市公司的企业所得税税负存在较大差异。企业所得税税负差异主要存在于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和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之间。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 基本回归分析

表 2 列示了财政竞争和三种预算软约束表现形式分别对企业税负影响的回归结果。由表 2 中模型(1)~模型(3)的估计结果可知,税收竞争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财政支出竞争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证实了假设 H₁。回归结果还显示,税收竞争变量的影响力度和显著性明显大于财政支出竞争。原因在于,财政分权不仅导致了财权不断向中央集中,也使得现实中的预算约束不断被突破。当地方政府利用税收为财政支出筹资的压力不断增大时,地方政府会广泛利用土地出让收入和融资平台债务为财政支出筹资,且普遍存在借助财政转移支付等公共池渠道进行支出成本转嫁的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提升企业税负的作用。

另外,模型(1)~模型(3)的估计结果还分别显示,转移支付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为正,土地出让收入和城投债发行额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转移支付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① 尽管 2018 年国地税改革后,企业所得税主要由地方税务局征管转变为由国家税务局征管,但这并不表明地方政府对企业所得税征管不存在干预。根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国地税合并后地方上的税务局要接受地方政府与国家税务总局的双重领导,这意味着税收征管活动在改革后依然部分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

② 企业所得税税基是应纳税所得额,应在会计利润的基础上,按照适用税收法规的规定进行调整而得。若直接除以企业利润总额则会高估企业所得税税负,出现计算结果高于法定税率的情况,尤其近年来经济下行、企业利润下降更易产生高估。

而土地出让收入和融资平台债务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税负,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是一致的。模型(1)~模型(3)的估计结果为假设 H_1 和假设 H_2 提供了证据。

表 2 财政竞争、预算软约束对企业税负影响的基础回归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i>Taxc</i>	-0.315 *** (0.017)	-0.171 *** (0.064)	-0.306 *** (0.026)
<i>Expc</i>	0.159 *** (0.041)	0.156 *** (0.052)	0.167 *** (0.048)
<i>Tra</i>	0.262 (0.098)		
<i>Ltf</i>		-0.132 ** (0.067)	
<i>Ctz</i>			-0.242 ** (0.109)
<i>Inasse</i>	0.018 *** (0.005)	0.015 *** (0.006)	0.018 *** (0.005)
<i>Age</i>	0.075 *** (0.023)	0.078 ** (0.032)	0.068 ** (0.034)
<i>Prr</i>	0.243 *** (0.026)	0.202 *** (0.030)	0.243 *** (0.026)
<i>PPE</i>	-0.001 (0.001)	-0.002 * (0.001)	-0.001 (0.001)
<i>Lev</i>	0.067 *** (0.016)	0.066 *** (0.017)	0.067 *** (0.016)
<i>Lemploy</i>	0.001 (0.004)	0.001 (0.004)	0.001 (0.004)
<i>TAT</i>	0.673 ** (0.332)	0.660 * (0.362)	0.692 ** (0.292)
<i>PerGDP</i>	-0.083 ** (0.036)	-0.091 ** (0.036)	-0.081 ** (0.033)
<i>Fzz</i>	0.063 (0.066)	0.085 (0.063)	0.072 (0.060)
<i>Sec</i>	0.183 ** (0.087)	0.162 * (0.093)	0.183 ** (0.086)
常数项	0.714 (0.551)	0.734 (0.631)	0.612 (0.635)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11980	11980	11980
调整 R^2	0.420	0.431	0.420

注: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所有标准误均聚类(Cluster)到省级层面; *、**、*** 分别表示在 10%、5%、1% 水平上显著,下同

2. 交互效应

本文在基准回归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财政竞争与不同预算软约束表现形式的交互项,考察两者间的交互效应,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结合表2基础回归结果分析,表3的模型(1)和模型(4)的估计结果显示,转移支付与税收竞争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与支出竞争交互项的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转移支付会弱化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的影响;模型(2)和模型(5)的估计结果显示,土地财政与税收竞争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与支出竞争交互项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土地财政会强化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的影响;模型(3)和模型(6)的估计结果显示,融资平台债务与税收竞争交互项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与支出竞争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融资平台债务会强化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的影响。上述结果充分表明,不同财政竞争方式与不同预算软约束表现形式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存在差异,这与假设H₃一致。

表3 财政竞争、预算软约束对企业税负交互效应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i>Comp</i>	<i>Taxc</i>	<i>Taxc</i>	<i>Taxc</i>	<i>Expc</i>	<i>Expc</i>	<i>Expc</i>
<i>Soft</i>	<i>Tra</i>	<i>Ltf</i>	<i>Ctz</i>	<i>Tra</i>	<i>Ltf</i>	<i>Ctz</i>
<i>Comp</i>	-0.606* (0.335)	-0.554* (0.298)	-0.565** (0.287)	0.322** (0.149)	0.136 (0.138)	0.246** (0.124)
<i>Soft</i>	-0.143** (0.061)	-0.498** (0.248)	-0.582** (0.288)	-0.817* (0.435)	-0.280 (0.251)	-0.522* (0.297)
<i>Comp × Soft</i>	0.369*** (0.124)	-0.817*** (0.124)	-0.484** (0.239)	-0.408* (0.239)	0.419** (0.183)	0.300*** (0.07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1980	11980	11980	11980	11980	11980
调整R ²	0.018	0.017	0.018	0.018	0.017	0.018

3. 稳健性检验

为对前文结论进行稳健性测试,接下来本文更换因变量和自变量度量方式以及使用工具变量法来开展辅助验证。

(1)更换因变量的衡量方式。为进一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借鉴刘骏和刘峰(2014)^[34]的做法,综合考虑各项税种以计算企业总体税负,衡量方式为:(支付的各项税费-收到的税费返还)/营业收入。如表4所示,财政竞争和三种预算软约束表现形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未发生明显改变,充分说明本文前述基准回归的结论是稳健的。

表4 基础回归稳健性检验:替换因变量衡量方式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i>Taxc</i>	-0.369*** (0.162)	-0.361** (0.180)	-0.345** (0.154)
<i>Expc</i>	0.286*** (0.103)	0.284** (0.124)	0.248*** (0.091)
<i>Tra</i>	0.109 (0.109)		

续表 4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i>Ltf</i>		-0.315** (0.147)	
<i>Ctz</i>			-0.302** (0.13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11980	11980	11980
调整 R ²	0.029	0.028	0.029

如表 5 所示,转移支付会弱化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的影响,而土地财政和融资平台债务会强化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的影响,这与前述交互效应回归结果是一致的。上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得到了证实。

表 5 交互效应稳健性检验:替换因变量衡量方式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i>Comp</i>	<i>Taxc</i>	<i>Taxc</i>	<i>Taxc</i>	<i>Expc</i>	<i>Expc</i>	<i>Expc</i>
<i>Soft</i>	<i>Tra</i>	<i>Ltf</i>	<i>Ctz</i>	<i>Tra</i>	<i>Ltf</i>	<i>Ctz</i>
<i>Comp</i>	-0.897** (0.351)	-0.667* (0.402)	0.723** (0.307)	0.486 (0.352)	0.496* (0.266)	0.333 (0.280)
<i>Soft</i>	-0.874* (0.419)	-0.497 (0.477)	-0.790 (0.653)	0.596** (0.302)	-0.570* (0.346)	-0.696* (0.437)
<i>Comp × Soft</i>	0.898*** (0.347)	0.722** (0.322)	0.643** (0.301)	0.673** (0.316)	0.958** (0.423)	0.754* (0.48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1980	11980	11980	11980	11980	11980
调整 R ²	0.032	0.032	0.032	0.032	0.032	0.032

(2) 更换自变量的衡量方式。本文通过变换自变量的测度方法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首先更换了自变量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的测量方法(具体测算方法如表 1 所示),同时借鉴范子英和张军(2010)^[35]的做法,将预算软约束变量转移支付、土地财政和融资平台债务的测量方法更换为转移支付、土地出让收入和城投债发行额与地方财政收入^①的比值。通过同时变换财政竞争变量和预算软约束变量的测量方法,对实证模型(1)和模型(2)重新进行回归。如表 6、表 7 结果表明,变换自变量测量方法不会引起实证结论的变化。

表 6 基础回归稳健性检验:替换自变量衡量方式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i>Taxc</i>	-0.629*** (0.232)	-0.701** (0.330)	-0.845*** (0.324)

① 财政收入是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各省份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续表 6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i>Expc</i>	0.586*** (0.203)	0.578** (0.214)	0.698** (0.307)
<i>Tra</i>	0.890 (0.689)		
<i>Ltf</i>		-0.425*** (0.137)	
<i>Ctz</i>			-0.622*** (0.25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11980	11980	11980
调整 R ²	0.032	0.032	0.032

表 7 交互效应稳健性检验:替换自变量衡量方式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i>Comp</i>	<i>Taxc</i>	<i>Taxc</i>	<i>Taxc</i>	<i>Expc</i>	<i>Expc</i>	<i>Expc</i>
<i>Soft</i>	<i>Tra</i>	<i>Ltf</i>	<i>Ctz</i>	<i>Tra</i>	<i>Ltf</i>	<i>Ctz</i>
<i>Comp</i>	-0.697* (0.391)	-0.627 (0.452)	-0.674* (0.351)	0.563 (0.373)	0.623* (0.356)	0.354* (0.221)
<i>Soft</i>	-0.574 (0.389)	-0.469* (0.278)	-0.674 (0.542)	0.487 (0.312)	-0.617* (0.357)	-0.731* (0.436)
<i>Comp × Soft</i>	0.798*** (0.301)	-0.692** (0.301)	-0.629** (0.319)	-0.752*** (0.276)	0.758** (0.323)	0.727** (0.32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1980	11980	11980	11980	11980	11980
调整 R ²	0.034	0.034	0.034	0.034	0.034	0.034

(3) 内生性问题的处理。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使用的是省级层面数据,被解释变量使用的是企业层面数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双向因果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为了进一步弱化这种潜在的内生性,本文使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实证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地方政府间财政竞争行为具有策略模仿的特征,一个省份的财政竞争强度与邻近地区的财政竞争强度显著相关,而邻近地区的财政竞争强度并不会对该地区企业的实际税负产生直接影响,同时本文认为邻近地区的财政竞争强度与影响该地区企业实际税负的不可观测因素不相关。因此,本文借鉴李戎等(2018)^[36]构造工具变量的思路,选取该地区邻近地区税收占 GDP 比重(取负数)的权重值作为该地区税收竞争的工具变量,并选取该地区邻近地区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的权重值作为该地区财政支出竞争的工具变量。具体计算过程为,本文先求得各地区税收占 GDP 比重(*Taxc*)和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Expc*),再利用反距离矩阵(w_{ij})^①,核算某一地区邻近地区税收占 GDP 比重的权重值

① $w_{ij} = \begin{cases} \frac{1}{d_{ij}^2} / \sum_{j=1}^N \frac{1}{d_{ij}^2}, & i \neq j \\ 0, & i = j \end{cases}$, d_{ij} 表示两个地区之间的距离。

(*Taxc_weight*) 和邻近地区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的权重值 (*Expc_weight*), 计算公式如下:

$$Taxc_weight = W \times Taxc \tag{5}$$

$$Expc_weight = W \times Expc \tag{6}$$

表 8 显示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 结果显示, 税收竞争的系数均显著为负, 财政支出竞争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转移支付的系数不显著, 土地出让收入的系数显著为负, 融资平台债务的系数显著为负, 这与基础回归的实证结果一致, 印证了本文的假设 H_1 和假设 H_2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在 1% 水平上显著, 这说明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强相关, 满足成为工具变量的条件。在此基础上, 本文检验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Kleibergen-Paap LM 统计量在 1% 的水平上显著, 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Kleibergen-Paap Wald rk F 统计量大于 10% 水平上的 Stock-Yogo 临界值, 拒绝了“工具变量弱识别”的原假设。上述检验结果充分表明工具变量选取合理, 不存在工具变量识别不足与工具变量弱识别的问题。

表 8 基础回归内生性检验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i>Taxc</i>	-0.334*** (0.125)	-0.359*** (0.126)	-0.259** (0.125)
<i>Expc</i>	0.229** (0.102)	0.235*** (0.077)	0.292*** (0.109)
<i>Tra</i>	0.158 (0.112)		
<i>Ltf</i>		-0.198 [*] (0.103)	
<i>Ctz</i>			-0.546*** (0.131)
Kleibergen-Paap LM 统计量	78.231*** [0.000]	67.364*** [0.000]	82.213*** [0.000]
Kleibergen-Paap Wald rk F 统计量	42.397 {16.38}	37.382 {16.38}	47.231 {16.3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11980	11980	11980
调整 R ²	0.036	0.033	0.035

注: [] 数值为 P 值, { } 数值为 Stock-Yogo 弱识别检验 10% 水平上的临界值

4. 异质性分析

为进一步考察财政竞争、预算软约束以及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税负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 本文划分不同地区和不同产权性质进行异质性分析。

(1) 地区异质性。本文按照企业注册地是否位于东部省份将样本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组^①, 引入东部地区哑变量与主要解释变量的交互项, 以考察财政竞争、预算软约束以及两者之间的交互

① 参考其他学者及国家统计局 2011 年 6 月 13 号颁布的对中国区域的划分办法, 本文中的东部省份是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中西部省份是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作用对企业税负的影响是否存在地区异质性。估计结果如表 9 所示。模型(1)~模型(3)的回归结果显示,在东部发达地区,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降低企业税负的作用相对较弱,而地方政府间财政支出竞争提高企业税负的作用更为显著。另外,模型(1)~模型(3)的估计结果还分别显示,地区哑变量与转移支付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与土地财政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与融资平台债务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相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降低企业税负的作用在东部发达地区相对较弱,土地出让收入减轻企业税负的作用也相对较弱,而融资平台债务减轻企业税负的作用更为明显。

表 9 财政竞争与预算软约束影响的地区异质性分析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i>Taxc</i>	-0.593 *** (0.194)	-0.424 ** (0.215)	-0.429 ** (0.202)
<i>Expc</i>	0.149 *** (0.054)	0.138 ** (0.069)	0.121 *** (0.041)
<i>Taxc</i> × <i>R</i>	0.620 ** (0.313)	0.854 * (0.518)	0.730 ** (0.367)
<i>Expc</i> × <i>R</i>	0.547 ** (0.200)	0.418 * (0.236)	0.376 ** (0.187)
<i>Tra</i>	-0.204 (0.356)		
<i>Ltf</i>		-0.130 ** (0.060)	
<i>Ctz</i>			-0.396 ** (0.199)
<i>Tra</i> × <i>R</i>	0.223 ** (0.104)		
<i>Ltf</i> × <i>R</i>		0.173 * (0.103)	
<i>Ctz</i> × <i>R</i>			-0.241 ** (0.09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11980	11980	11980
调整 R ²	0.023	0.023	0.023

如表 10 所示,财政竞争与预算软约束交互效应的地区异质性回归结果。首先,模型(1)和模型(4)的估计结果显示,税收竞争、转移支付和地区哑变量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财政支出竞争、转移支付和地区哑变量交互项的系数不显著为正。结合表 3 的估计结果进行分析,转移支付弱化税收竞争降低企业税负的作用在东部发达地区表现更为明显,而转移支付弱化财政支出竞争提升企业税负的作用不存在地区异质性。这是因为,中西部地区财力相对薄弱,因而偏好以税收竞争方式为主的财政竞争方式;东部地区财力雄厚,因而偏好以财政支出竞争方式为主的财政竞争方式,

并且其对转移支付的依赖性较低。中央转移支付资金能够有效缓解中西部省份的财政压力,并调整和优化其财政竞争行为,但是其对转移支付资金的依赖性较高。而税源充裕、财力较强的东部省份能够较为充分利用好中央财政资金的援助,其用转移支付替代地方税收收入的动机更为强烈,因而转移支付弱化东部省份税收竞争行为的作用更为明显。由于地方政府官员普遍存在政治激励和经济激励,难以受到转移支付的激励而主动削弱财政支出竞争,故而转移支付对财政支出竞争行为的弱化作用实际不存在地区异质性。其次,模型(2)和模型(5)的估计结果显示,税收竞争、土地财政和地区哑变量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财政支出竞争、土地财政和地区哑变量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结合表 3 的估计结果进行分析,土地出让收入对财政竞争的强化作用在中西部地区表现更为明显。这是因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预算收入相对充足,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较小。2003 年之后,中央政府收紧了东部地区的土地供应,并且对“招、拍、挂”等土地出让制度的监管更加严格^①,而中西部地区的土地供应指标却相对放开,进而导致中西部地区更为依赖土地财政。最后,模型(3)和模型(6)的估计结果显示,税收竞争、融资平台债务和地区哑变量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财政支出竞争、融资平台债务和地区哑变量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结合表 3 的估计结果进行分析,融资平台债务对财政竞争的强化作用在东部地区表现更为明显。这是因为,东部地区拥有更加庞大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和更加广泛的政府融资渠道,在面临较大财政支出竞争和税收竞争压力时能够通过发行城投债的方式减轻压力。截至 2018 年底,东部地区由融资平台发行的城投债占到了全国城投债发行总额的 57.06%^②,而中西部地区发行城投债的比例相对较低,有限的债务融资渠道使得中西部地区通过融资平台发行城投债减轻财政竞争压力的难度增大,这使得东部地区更为依赖融资平台进行债务融资。表 9 和表 10 的结果支持了假设 H₄。

表 10 财政竞争与预算软约束交互效应的地区异质性分析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i>Comp</i>	<i>Taxc</i>	<i>Taxc</i>	<i>Taxc</i>	<i>ExpC</i>	<i>ExpC</i>	<i>ExpC</i>
<i>Soft</i>	<i>Tra</i>	<i>Ltf</i>	<i>Ctz</i>	<i>Tra</i>	<i>Ltf</i>	<i>Ctz</i>
<i>Comp</i>	-0.581* (0.339)	0.583** (0.294)	-0.121 (0.277)	0.356** (0.174)	0.293** (0.142)	0.094 (0.128)
<i>Soft</i>	-0.815** (0.389)	0.575** (0.288)	-0.324 (0.440)	-0.995* (0.519)	-0.442* (0.262)	-0.675* (0.360)
<i>Comp × Soft</i>	1.443* (0.867)	-1.547* (0.837)	0.924** (0.440)	-2.035* (1.118)	1.733* (1.072)	0.426 (1.237)
<i>Comp × Soft × R</i>	4.937*** (1.737)	1.697** (0.853)	-2.415* (1.324)	0.664 (0.919)	-0.551* (0.290)	2.594** (1.05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1980	11980	11980	11980	11980	11980
调整 R ²	0.023	0.021	0.022	0.022	0.021	0.022

① 详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3]70号)。

② 数据来源于 WIND 数据库,经过计算加总而得。

(2) 产权异质性分析。本文按企业产权性质将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其中非国有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其他企业。估计结果如表 11 所示,税收竞争与产权性质虚拟变量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财政支出竞争与产权性质虚拟变量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转移支付、土地财政和融资平台债务与产权性质虚拟变量交互项的系数均不显著。结合表 2 的估计结果进行分析,相对非国有企业,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降低国有企业税负的作用更为明显,地方政府间财政支出竞争提高国有企业税负的作用也更为明显。而预算软约束对企业税负的产权异质性作用不显著。这与假设 H_5 的分析一致。

表 11 财政竞争与预算软约束影响的产权异质性分析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i>Taxc</i>	-1.206** (0.505)	-1.311*** (0.440)	-1.535*** (0.435)
<i>Expc</i>	0.624** (0.244)	0.381** (0.186)	0.360** (0.186)
<i>Taxc</i> × <i>S</i>	-0.896* (0.491)	-0.935** (0.453)	-0.956** (0.445)
<i>Expc</i> × <i>S</i>	0.361* (0.213)	0.431** (0.186)	0.372** (0.186)
<i>Tra</i>	-0.645 (0.438)		
<i>Ltf</i>		-0.197* (0.117)	
<i>Ctz</i>			-0.371** (0.186)
<i>Tra</i> × <i>S</i>	0.478 (0.360)		
<i>Ltf</i> × <i>S</i>		-0.040 (0.146)	
<i>Ctz</i> × <i>S</i>			-0.189 (0.21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11980	11980	11980
调整 R^2	0.022	0.021	0.022

五、结论与建议

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不仅取决于减税降费政策的力度,同时也要求财税体制的不断优化,以及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的不断规范。本文从财政制度层面出发,探究现行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

竞争、不同预算软约束表现形式及两者之间的交互效应对企业税负的影响。研究表明:(1)税收竞争显著降低企业税负,而财政支出竞争显著提升企业税负。税收竞争的影响力度和显著性明显大于财政支出竞争。(2)不同预算软约束表现形式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存在差异。转移支付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而土地出让收入和融资平台债务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税负。(3)财政竞争和预算软约束的交互效应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转移支付会弱化地方政府间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具体表现为,转移支付会弱化税收竞争降低企业税负的作用,同时也会弱化财政支出竞争提高企业税负的作用。与之相反,土地出让收入和融资平台债务会强化地方政府间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土地出让收入和融资平台债务均会强化税收竞争降低企业税负的作用,同时均会强化财政支出竞争提高企业税负的作用。(4)相比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降低企业税负的作用相对较弱,地方政府间财政支出竞争提高企业税负的作用更为明显,转移支付降低企业税负的作用相对较弱,土地出让收入减轻企业税负的作用相对较弱,而融资平台债务减轻企业税负的作用更为明显。转移支付弱化税收竞争降低企业税负的作用在东部发达地区更为明显,而转移支付弱化财政支出竞争提高企业税负的作用不存在地区异质性。土地出让收入强化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的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为明显。融资平台债务强化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的作用在东部地区更为明显。(5)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降低企业税负的作用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且地方政府间财政支出竞争提高企业税负的作用在国有企业中也表现更为明显。预算软约束对企业税负的作用不存在企业产权性质异质性。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为了有效降低企业税负,地方政府会突破预算框架参与过度财政竞争。因此,一方面,应当构建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统一的现代财政体制,完善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管理体制,并健全地方税体系,以实现区域间财力格局稳定,减轻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另一方面,应当将一些反映地方财政运行情况的指标纳入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中,防止地方政府过度进行财政竞争,从根本上改变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扭曲。

第二,继续优化转移支付拨付制度和标准,减少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随意性和临时性,同时应当健全财政转移支付中的问责、监督和惩罚机制等,严格把控转移支付资金用途,引导地方政府合理利用转移支付资金,避免转移支付引发的道德风险和逆向激励问题,最大化发挥转移支付弥补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缺口和改善地方政府财政竞争行为的作用。

第三,财政竞争和预算软约束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存在明显差异,故必须在不同地区设计差异化的财政政策。因此,应加大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发挥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正向调节作用;出台相应政策监管和控制中西部地区的土地出让规模;加快发展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市场,使之建立起高效的融资平台和地方债市场。同时,建立健全考核问责机制和地方政府信用评级制度,激励地方政府自觉规范财政行为。

第四,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因此,应当关注地方政府财政竞争行为会引起歧视性征税这一现象,着力解决企业产权性质异质性导致的税收扭曲。应当规范地方政府财政竞争行为,在推进减税降费政策时对各类产权性质企业一视同仁,以创造税负公平的营商环境。

第五,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可能会加剧地方财政压力,并激化地方政府间财政竞争行为。因此,不应盲目加大减税降费政策力度进而加剧地方财政压力,应当科学设计财税体制以规范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行为,同时应减少地方政府对预算软约束的操作空间和影响程度,唯此才能在保证地方财政规范性与可持续性的前提下有效降低企业税负。

参考文献

- [1] Alesina, A., F. R. Campante, and G. Tabellini. Why is Fiscal Policy Often Procyclical? [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8, 6, (5): 1006 - 1036.
- [2] 钱海刚. 财政分权、预算软约束与地方政府恶性竞争[J]. 北京: 财政研究, 2009, (3): 17 - 19.
- [3] Chirinko, R. S., and D. J. Wilson. Can Lower Tax Rates be Bought? Business Rent-seeking and Tax Competition among the US States [J]. *National Tax Journal*, 2010, 63, (4): 967 - 993.
- [4] 胡洪曙, 郭传义. 我国政府间纵向税收竞争对税收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北京: 经济管理, 2014, (12): 1 - 12.
- [5] 龙小宁, 朱艳丽, 蔡伟贤, 李少民.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中国县级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实证分析[J]. 北京: 经济研究, 2014, (8): 41 - 53.
- [6] Maniloff, P., and D. T. Manning. Jurisdictional Tax Competition and the Division of Nonrenewable Resource Rents [J]. *Environmental & Resource Economics*, 2017, 71, (1): 179 - 204.
- [7] 李明, 赵旭杰, 冯强. 经济波动中的中国地方政府与企业税负: 以企业所得税为例[J]. 北京: 世界经济, 2016, (11): 104 - 125.
- [8] 范子英, 田彬彬. 税收竞争、税收执法与企业避税[J]. 北京: 经济研究, 2013, (9): 99 - 111.
- [9] 贾俊雪, 应世为. 财政分权与企业税收激励——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的分析[J]. 北京: 中国工业经济, 2016, (10): 23 - 39.
- [10] 肖叶, 邱磊, 刘小兵. 地方政府竞争、财政支出偏向与区域技术创新[J]. 北京: 经济管理, 2019, (7): 20 - 35.
- [11] Goodspeed, T. J. Bailouts in a federation [J].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 2002, 9, (4): 409 - 421.
- [12] Ong, L. H. Fiscal Federalism and Soft Budget Constraints: The Case of China [J].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2, 33, (4): 455 - 474.
- [13] 胡祖铨, 黄夏岚, 刘怡.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与地方征税努力——来自中国财政实践的证据[J]. 北京: 经济学(季刊), 2013, (3): 799 - 822.
- [14] 付文林, 赵永辉. 财政转移支付与地方征税行为[J]. 北京: 财政研究, 2016, (6): 16 - 27.
- [15] 王雪婷, 胡奕明. 房价与企业税负的“租税替代”关系——基于1999—2015年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J]. 北京: 财政研究, 2018, (7): 91 - 105.
- [16] 李永友. 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间财政竞争[J].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 2015, (10): 114 - 133, 206.
- [17] 杜彤伟, 张屹山, 李天宇. 财政竞争、预算软约束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J]. 上海: 财经研究, 2020, (11): 93 - 107.
- [18] Li, H. B., and L. A. Zhou. Political Turn 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5, 89, (9 - 10): 1743 - 1762.
- [19] 李永友, 沈坤荣. 辖区间竞争、策略性财政政策与FDI增长绩效的区域特征[J]. 北京: 经济研究, 2008, (5): 58 - 69.
- [20] 吕冰洋, 马光荣, 毛捷. 分税与税率: 从政府到企业[J]. 北京: 经济研究, 2016, (7): 13 - 28.
- [21] 余泳泽, 张少辉, 杜运苏.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J]. 北京: 世界经济, 2019, (10): 120 - 142.
- [22] 储德银, 邵娇, 迟淑娴. 财政体制失衡抑制了地方政府税收努力吗? [J]. 北京: 经济研究, 2019, (10): 41 - 56.
- [23] Liu, Y. Does Competition for Capital Discipline Governments? The Role of Fiscal Equalization [J].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 2014, 21, (3): 345 - 374.
- [24] 贾俊雪, 郭庆旺, 高立.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激励效应与地区间财政支出竞争[J]. 北京: 财贸经济, 2010, (11): 52 - 57.
- [25] 雷潇雨, 龚六堂. 基于土地出让的工业化与城镇化[J]. 北京: 管理世界, 2014, (9): 29 - 41.
- [26] 饶品贵, 汤晟, 李晓溪. 地方政府债务的挤出效应: 基于企业杠杆操纵的证据[J]. 北京: 中国工业经济, 2022, (1): 151 - 169.
- [27] 王文剑, 仇建涛, 覃成林.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FDI的增长效应[J]. 北京: 管理世界, 2007, (3): 13 - 22, 171.
- [28] 肖叶, 刘小兵. 税收竞争促进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吗? ——基于总量与结构双重视角[J]. 北京: 财政研究, 2018, (5): 60 - 74, 45.
- [29] 毛捷, 黄春元. 地方债务、区域差异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地级市数据的验证[J]. 北京: 金融研究, 2018, (5): 1 - 19.
- [30] 陈冬, 孔墨奇, 王红建. 投我以桃, 报之以李: 经济周期与国企避税[J]. 北京: 管理世界, 2016, (5): 46 - 63.
- [31] 王小龙, 余龙. 财政转移支付的不确定性与企业实际税负[J]. 北京: 中国工业经济, 2018, (9): 155 - 173.
- [32] 陈晓光. 财政压力、税收征管与地区不平等[J].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 2016, (4): 53 - 70, 206.
- [33] 储德银, 费冒盛. 财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治理[J]. 北京: 财贸经济, 2021, (2): 51 - 66.
- [34] 刘骏, 刘峰. 财政集权、政府控制与企业税负——来自中国的证据[J]. 北京: 会计研究, 2014, (1): 21 - 27, 94.
- [35] 范子英, 张军. 粘纸效应: 对地方政府规模膨胀的一种解释[J]. 北京: 中国工业经济, 2010, (12): 5 - 15.
- [36] 李戎, 张凯强, 吕冰洋. 减税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J]. 武汉: 经济评论, 2018, (4): 3 - 17, 30.

Fiscal Competition,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nd Corporate Tax Burden

HU Hong-shu, LI Jie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Hubei, 430073,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ast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Continuous large-scale tax and fee reduction policy has implemented. Reducing the tax burden of enterprises not only depends on the intensity of tax and fee reduction policies, but also requires the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of the fiscal and taxation system and its decision-making local government fiscal competition strategi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mpact of local government fiscal competition, different manifestations of soft budget constraints, and the interaction on the tax burden of enterprises under th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System. This paper selects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excluding Tibet,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and the Shanghai and Shenzhen Main Board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9 to 2018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fiscal competition and soft budget constraints on corporate tax burdens.

The empirical results found that tax competition significantly reduces corporate tax burdens, while fiscal expenditure competition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corporate tax burdens. The impact and significance of tax competition is greater than fiscal expenditure competition. The impact of transfer payments on corporate tax burden is uncertain, and land transfer income and financing platform debt significantly reduce corporate tax burden. The interaction effect shows that transfer payments will weaken the fiscal competi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while land finance and financing platform debt strengthen the fiscal competi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Compared with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ax competition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in the eastern region has a relatively weak effect in reducing corporate tax burdens, and competition in fiscal expenditures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s has a more obvious effect in increasing corporate tax burdens. Land transfer revenue has a relatively greater effect in reducing corporate tax burdens. The role of financing platform debt in reducing corporate tax burden does not have regional heterogeneity. The weakening effect of transfer payments on tax competition is more obvious in the eastern developed regions, while the weakening effect of transfer payments on fiscal expenditure competition does not have regional heterogeneity. The strengthening effect of land transfer revenue on fiscal competition is more obviou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strengthening effect of financing platform debt on fiscal competition is more obvious in the eastern region. Differences also exist in enterprises with different property rights. The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 tax competition in reducing corporate tax burden is more obviou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 fiscal expenditure competition in increasing corporate tax burden is also more obviou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effect of soft budget constraints on corporate tax burden does not have the heterogeneity of corporate property rights.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article are as follows. First,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impact of fiscal competition and soft budget constraints on corporate tax burdens from the fiscal system level.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esign fair and reasonable tax policie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tax burden of enterprises. Second, this paper incorporates fiscal competition, soft budget constraints, and corporate tax burden into the sam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systematic research, and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three different manifestations of soft budget constraints from transfer payments, land finance, and financing platform debt. Function channel and influence effect. It is helpful to comprehensively examine the difference in the tax burden of enterprises by different fiscal competition modes and different manifestations of soft budget constraints and the interaction within the sam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rd, it examines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impact of fiscal competition and soft budget constraints on corporate tax burdens by region and the nature of property rights. Since enterprises with different regions and different property rights are affected differently by local government behaviors, there are bound to be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s of tax competition and fiscal expenditure competition. A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these differences under the same framework will help design differentiated fiscal policies.

Key Words: fiscal competition; soft budget constraint; interaction effect; corporate tax burden

JEL Classification: H32, H60, H70, H71

DOI: 10.19616/j.cnki.bmj.2022.06.009

(责任编辑: 闫梅)